

大難將臨上蒼示警

李郁塘

——堯樂博士傳之四十六

隱姓埋名變換身份

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廿三日，甘肅省政府自蘭州播遷哈密以後，由陝（西）、甘（肅）、青（海）、寧（夏）、綏（遠）大西北五省的反共志士相率前來新疆者，絡繹於途，大有人在。在廿五日前，這些乘客仍冀求於駐新十萬國軍的庇護下，即使因人地不宜，不能在新疆參與抗共工作，至少可留在哈密作自由難民。因而他們都還能不聲不響，沉得住氣；或暫棲身於哈密旅邸，或寄住於各省同鄉家中，靜觀時局發展，再定行止。不意時過兩日，於九月廿六日清晨，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與新疆省主席鮑爾漢竟視節，聯名通電降共。原是青天白日下的國土，一下就變成昏天黑地，墜入鐵幕之內。這些集聚在哈密的避秦義士就得另行設法，再求生計了。其中旅蕩較豐者，就乘鐵幕甫垂的空隙與降僑們睜眼閉眼的時期，即時急走南疆，西行出國，遠飛自由天地，去求生路；但川資欠缺，囊空如洗者，則不能作如斯想。此外再因年事已高，或身體羸弱，自信無力橫度塔里木大戈壁，翻越帕米爾高原者就得在哈密再求生計了。另找求生之途的最有效辦法，就是隱姓埋名，好掩去往昔服公的罪狀。而隱姓埋名最捷徑之途，就是在哈密換上一張

舊身份證，便可如願以償。

筆者時任全疆戶政主管，尤在哈密出任區警察局長多年。想在哈密換身份證者，若來託我進行，可說是最好的門路。一開始想到此門路者，清一色都是出身於蘭州警校的前後期同學。他們就以同學的關係，不管認識與否，紛紛前來求助。其次是軍統局派駐西北各省的國特們也以同學同志之誼，前來求助。再次是服務於西北各大城市的憲兵，以及黨（國民黨）、團（三青團）人員也以人求人的方法，輾轉來求。此時此境，已成這些人的生死關頭，我不能讓共產黨來殺棄漢節者的頭，也就有求必應加以援助。

這些由西北各省來到哈密為躲紅劫的義士們，於今要換身份證，不僅是私事，尤需保密。因而進行此事，既不能在哈密警察局進行；也不宜在哈密專署來辦理，只能秘密在我任家來完成。而我當時正奉堯專員之命積極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事宜，根本抽不出時間再辦他事。在萬般無奈情形下，祇好將服務於哈密警察局的堂弟李向塘，令其由警局拾來兩箱舊身份證，移到自宅，專責為他人換身份證。日以繼夜為求助者服務，尤以夜間人數為多。直至十月四日，因中共軍由甘入新，我也被迫離開哈密時，此事才告結束。自九月廿四日起，至十月四日止，在短短十日內

因換身份證而被救活的人數，以每日少則二二十人，多則四五十人，平均下來也有三百多人之譜。古人云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」。而我竟在民國卅八年九月底至十月初，高造了二百多級的浮屠，可算是我此生一大功德事。

就在我再行搜集電臺，自行編造密碼本，及秘密羅致電臺技術人員，緊鑼密鼓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，忙得不可開交的一日，哈密縣警察局王督察長突然前來哈密專署來找我。一見面就開門見山提出主題的說：

「有好多山西老鄉被困哈密，一籌莫展不能成行。快請副專員一伸援手，為他們找車解困，以便早日西行出國，避過紅劫。」

反共中堅人士西奔

王督察長說完話後，順手交給我一張被困人的名單。俟我過目以後，均僅聞其名而未曾晤過面，唯在堯專員請客時，有幾人會過面，也僅一面之緣。如綏遠省政府主計處長邊西笙（韓克溫），隴海鐵路黨部立法委員方立人（馮大韞），蘭州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趙采晨，民國日報社長關潔民，中廣公司主任劉士烈，中央通訊社主任唐雄，北平藝專教授張立齋，東北行轅外事處主任呂仕倫，憲兵連長劉士達等六十餘人。其

中以晉籍人士居多，以服務於西北各省者為衆。總而言之，都是國民黨的反共中堅人物。他們在蘭州撤退時，因業務上的關係，均能搭乘甘肅省政府及長官部第二處的專車，西行哈密。於今甘肅省政府，又奉降將陶峙岳逆命，再乘原車東返蘭州，長官部第二處爲了追隨新疆出國軍政要員，也兼程西行，就此這些搭便車的人，被棄於哈密。雖經多日自行設法，終因人生地不熟，無法找到西行車輛。卒因哈密警察局，沒收這些人的電臺時，被關潔民聽出王督察長操得山西趙城鄉音。如此走投無路之時，乃藉小同鄉之誼，去向王督察長求助。但王督察長獲得此情後，自感在哈密地方上，人微言輕無此力量，乃前來專署要請筆者爲所困同鄉們一伸援手了！

按理來說，這批同鄉們被甘肅省政府與長官部第二處遺棄以後，就應直接找我來幫忙解困的。原因是他省人前來求我解困，我都有求必應。而本省同鄉有困難，那能袖手旁觀呢？然而他們並未如此做。其中有兩個原因：其一山西人素有一種傳統美德，凡事盡己之力去解決，不可輕易去打擾別人。其二我雖是土生土長道地的山西人，三級學校由小學中學至大學的歷程也都在本省經過。但在大學結業之年，正趕上「七七事變」。我的故鄉位於平綏與同蒲鐵路的交點上，時僅一月，家鄉淪陷。戴上方帽子的青年，怎能給日寇作順民。於是投筆從戎，移孝作忠。直奔西安投入中央軍校，作了十五期的入伍生，翌年春又被胡宗南上將保送給戴笠將軍，作了中央警校蘭州特訓班第一期學員，埋頭苦讀了兩三年。卒業

以後，先以緝私工作服務於甘肅；繼以警察業務服務於新疆，對故鄉山西反而繳了白卷。因而山西省的顯要們既不知有我，我認知的山西人也沒有幾人。因此當這批避秦同鄉受困於哈密後，根本不知有我這號人物，能爲他們紓危解困！

環顧當時環境，哈密商家很少有自用大卡車，而各機關的自備車輛，在此兵荒馬亂時，誰還願意出遠門。最後祇有打西北路局哈密分站的主意。在我想來十有八九可以辦到。原因是當西北路局由酒泉向哈密伸展業務時，我正任哈密區警察局長，從中幫過路局很大的忙。如哈密營業站所，停車廠地，以及眷屬住處都經我一手爲他們促成。而路局當局爲了適應環境，所派的站長、廠長、電臺臺長，大都是山西籍。古人云：「人不親土親」。當我偕同王督察長，趕到哈密西北路局車站，即時言明有五六十位山西老鄉西行無車，要包兩輛路局客車直達喀什時，該站長竟以總局失陷，無法請示爲由，加以婉拒。我一看情勢不妙，即時以副專員的身份提出指正的說：「新疆境內的事，由新疆人自己解決，何必請示呢？」一因我是現任哈密副專員；二因我過去爲路局幫過忙；三因乘客大都是山西同鄉。最後商妥的辦法是，以由哈密到喀什的客車票價，包僱兩輛大卡車，爲了迅速行車計，沿途不再招客，直達喀什。我當時正緊鑼密鼓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事宜，已無暇再爲這些同鄉們跑腿，祇希望他們早日西行，逃出鐵幕就好。至於包車訂約，以及付價諸多手續，均由王督察長協同關潔民先生去一辦理。由哈密到喀什的距離，在左文裏公進軍

新疆時，規定爲三個半十八馬站，總計起來約有二千公里之遙。沿途沙漠綿互，人煙又少，若經此路遠行，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如服裝不準備好可能凍死。沿途乾糧糧帶不足可能餓死。如無常用藥品可能病死。因此關潔民先生等雖已包僱到了專用汽車，仍然不能說走就走。有的人要購買途中所需用品；有的人要出售不需之物，好變作出國川資。再加大數衆多，相互牽扯，雖有了行的工具，仍在哈密多停留了四五天。就在此四五天中，哈密的天象與人間都發生突變情景，真是出人意外。

十月桃開大禍臨頭

民國卅八年十月一日，我爲籌組新疆反共游擊總部所需電臺，乃去縣警局查舊案，全市各機關共有多少電臺，以備不久展開反共游擊戰時，前來借用。乃去縣警局重查舊卷。在查畢此事甫行走出警局大門，迎面就遇到哈密商會田會長，由其郊區花園回來。手中持着盛開的桃花折枝，一週我面劈頭就說：

「在深秋十月，竟然桃花盛開，真是天下怪事？今古奇觀？李局長您說怪不怪？」

「哈密近幾日的氣候，反常和暖，有如深春。桃花盛開，乃受氣候影響，何足怪哉？」

田會長聽畢我的回言仍存疑竇，不能滿意接著又說：

「如受氣候和暖影響，其他花樹也應同開。我的果樹園中，桃、李、杏都渾，而今僅有桃花開，李、杏未然，又係何因？」

田會長再度追問桃花獨開的原因，使我一時語塞，無言回答。他的西來順店面，就在警局斜對面，我們二人走了幾步路，就同到他的店裏。此時他的會客室裏，正有曾任伊犁區警察局長，現任哈密專署教育處長呂春浦，因洽公務，正在西來順客室等候田會長，一見田會長手中持着盛開桃花的折枝，就大驚失色，對着我說：

「這是上蒼示警，新疆境內，哈密人間，將有大難，能走的人趕快在十月內，逃離新疆，去躲大難吧！」

呂春浦此言一出，我大不以為然，乃即時加以反駁：

「十月桃花開，怎能就知哈密將有大難？你老兄不能信口雌黃謠言惑眾呀？」

「我敢說此話，既非信口雌黃？也不是謠言惑眾？乃係經驗之談呢！」

呂春浦接下就道出五年前，在伊犁事變前的一段往事，源源本本的道了出來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：那天正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一日，伊犁街頭突然出現一位老道士，右手掌中端了一個柿子，左手掌中放有一棗一梨。在大街上邊走邊喊：「柿——棗梨」，柿音單獨，棗梨相連。很有節拍韻道，頗能引人注目。在新疆日用水菓中來說，棗梨各地均產，居民常吃當不稀罕，惟獨柿子絕無僅有。因此想買柿子的人，大有人在。不過每個想買柿子的居民，一到老道士身邊，發現掌中的柿子，已經爛透，不僅不能吃，即想拿也拿不起，使想買柿子的人，統統失望而去。就此讓那人無名老道士，無止境的沿着各條大街喊售

下去。

當年新疆警察最具權威，凡街頭上有風吹草動的事，警察當局都要過問。俟呂春浦區警察局長聽聞到此事後，就令值日官到街上，將那位老道士請到區局裏，查詢追問一下，他手掌裏僅有三物，為何要在伊犁街頭上沿街喊售，是何居心？有何用意？但該老道士已杳如黃鶴，遍行不着，不知去向了。呂局長獲得值日官遍尋不着老道士的報告後，深覺這個老道士來的突然，去的杳然。所持三物，棗梨是好的，柿子是爛的。爛柿的諧音就是亂事或亂弒，總而言之不是好事。而棗梨則是好的，就是勸人早離伊犁為宜。呂氏旋又想到，這個老道士身着漢裝，口喊漢語，莫非漢族人要遭大劫。他突然出現伊犁街頭，就是示警漢族人，要早離伊犁為妙！而自己就是漢族人，也宜早日離開伊犁為妙！

適是月十日為新疆省政府改組之期，由吳忠信繼盛世才出任省主席。由胡國振繼李英奇出任警務處長，這是請辭區警局長最好的機會。乃藉口為新任省主席，及警務處長任人事方便計。逕向舊任處長李英奇，請辭伊犁區警察局長之職。李英奇以為呂局長與他同進退，當即回電示准。呂氏接電以後，就將區局大印暫交副局長代行任務。旋於十月六日，乘中蘇班機，平平安安，光光彩彩的回到省城迪化。巨料，就在翌日，也就是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，正逢俄帝國慶日，俄酋史達林命令伊犁俄國領事館，以慶祝國慶為由，廣招當地叛亂份子，予以武裝。先之在山區殺人放火，繼之在城市殺警驅兵發動了所謂「伊犁

事變」。早離一日的他什麼事也沒有。未離伊犁九域的軍民，有數萬之眾，結果統統死難，成了亂弒下的犧牲者。因此當呂春浦斂完伊犁事變，漢族人遭劫的往事後，就直言硬指的說：「天時反常，十月桃開，就是上天示警，要知命者，在十月以內，趕快逃離新疆，以避紅劫！往事可鑑，不可不信！」

筆者當時正在加速佈署天山區游擊總部事宜，自信在十月以內可以完成。屆時當然要離開哈密城。我積極籌組反共游擊總部，就是為躲紅劫。因此俟呂春浦述完他的警語心意後，我也聽過算了，不再放在心上。

史魔催促毛共入新

就在哈密桃花盛開的那天（民國卅八年十月一日），毛魯澤東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裏沐猴而冠，自封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主席，南面稱王。史達林認為「中華人民共和國」的誕生，就是共產祖國又生了一個「兒子」，是一件大喜事。除即時承認外，並去電致賀。此外再解除中共軍不得進入新疆之限令，指令毛魯派十萬大軍，於十月五日，開入新疆。以便早日收平譁變全疆的原駐十萬國軍。

毛魯魯得能在北平懷仁堂內稱孤道寡，南面稱王，得有今日的風光，完全由史達林一手扶持所造成。因而對史達林的態度，一向是言聽計從，不敢有違。一月前不讓他開一兵一卒進入新疆，當然不敢有違，只好讓一野大軍止兵於嘉峪關內。於今又令他逃開十萬大軍進入新疆，當然還

行無誤。但因一野司令員彭德懷，正在北平參加中共立國大典，留在北平。一因平新路途遙遠；二因當時飛機有限，致無法趕返西北。而史達林的限令，又不能違。只好致電坐鎮蘭州的一野二號大員王震遵令辦理。王震獲電以後，先電進駐酒泉郭鵬第二軍，即日西行入新。務必於十月五日前，趕抵哈密。再電進駐武威的羅元發第六軍，隨後推進，赴新增援。以便早日收平新疆兵變事件，達成史達林的要求。

由酒泉至哈密的行程，在清末左文襄公行軍的規定，算是一個十八馬站。即快馬加鞭要走十八天，騎毛驢乘駱駝需時一個月。於今改乘大卡車，約需四整天。若在夜間加班趕路兩天半，或三天內也可抵達。這是由酒泉到哈密的路況。

當年（民國三十三年、四年間）國軍由甘肅河西開入新疆時，每團步兵約需卅五—四十輛大卡車。一師三團就需百輛之多。十師十萬人就需千輛之譜。尤且需時一年多，始開拔完畢，由此可知，要運送大軍，真不是易事。於今史達林要中共當局，於最短期內，搶運十萬中共軍入新鎮變。那如何能作到呢？何況中共軍甫由游擊隊，改成正規軍。立國才有半天，那有上千輛的軍兵車，集中到蘭州備用呢？這樣重大情事，一野司令員彭德懷固然辦不到；即使南面稱王的毛澤東又何能辦到呢？然而史達林御下，一向是言出必行，不能打折扣的。尤且在中共立國之日說出的話，非要一一兌現不可，才能向毛澤東立威信。但他也深知中共方面，沒有運送十萬軍隊入新的工具，非由俄國幫忙不可。乃指令蘇俄駐阿拉木圖

空軍司令部，於最短期內，據派五十架巨型運輸機，飛抵蘭州趕運中共十萬大軍，進入新疆。中共一野所屬的第二、第六、第五三個軍約十萬人，果於一月內，源源開入新疆。這是後話，容後再述。

哈密孤城首當其衝

新疆大局，日行惡化，哈密已成爲反共的孤島，漸有不能生存立足之感！非及早組成反共游擊總部，無以爲生了！我於十月一日去警察局查舊案，全城還有卅三部電臺。除軍事機關所屬外，金融交通等機關，尚有廿餘臺，足夠展開游擊時所需。次一問題，就是自造密碼本。乃於十月二日一整天，協助許吉清總臺長將樣本完成。至於所需複製本，由許總臺長負責完成。第三個重要課題，就反共總部地點的尋覓。總部最好的地點，當然是天山主峯的八大石。但在甫行展開游擊工作時，爲了便於連絡與指揮，設在哈密較偏僻的城鎮爲宜。尤以鎮西縣城最爲適當。

鎮西又名巴里坤，是哈民聚居之地，哈族副專員阿通伯克就居城外。駐防的國軍是一七八旅第二團，該團全團官兵都是田子梅的子弟兵。如由田子梅前去作導引，由現在的駐防軍，變成未來的游擊隊，乃是水到渠成，不費吹灰之力的事。當我有了這個構想後，就於十月三日上午，前往他的下榻處，拜訪面商。會面以後，先探詢他的病情，大有進展，行動上已無問題，接下就將主題提出。反共游擊總部擬先設在鎮西城，以便號召，然後再轉進到天山主峯八大石，以策安全

。其中唯一成問題者，就是該團忠貞問題了！我的話甫畢，田子梅接下就說，該團忠貞決無問題，我敢保證。不過爲了萬全計，我以養病爲由，近日就移駐鎮西予以說項進行。如一切順利的話，你跟專員隨後再來。

關於反共游擊總部佈署事宜，算是初步定案。在十月三日上午，我跟田子梅會商定案後，即日下午就乘上班時，進入專員室，將近日內佈署反共游擊總部事宜，向專員秘書密作簡報。專員聽畢非常高興。就在我倆人相商密議時，專員辦公桌上的電話，突然鈴聲大作。當專員拿起耳機一聽，是由省城打來的長途電話。發話人竟是甫當降將軍頭陶峙岳。他劈頭第一句話就問：「聽說民政廳警政科長李郁塘，東返哈密。他現在是否還留在哈密？」

堯樂博士兩眼睜着我，嘴巴却不着邊際予以回答：「聽說尚在哈密，總座找他有事嗎？」
「中共大軍就要由河西開入新疆！今晚要抵星星峽，明晚要到哈密。請你轉知他，即時離開新疆，勿在哈密停留！」

「即使中共大軍明晚由甘入新，我還是哈密專員，我仍可保護全區數十萬居民，多一個李郁塘，也沒有多大關係？」

「這個關係可大了，你雖能保護全區數十萬居民。但一個李郁塘，却難能保護得了。因爲中統軍統兩局在新人員，我都迫令他們撤離新疆；現在國特號的人員，僅剩下他一個尚未離境。他是軍統局的中堅，戴雨農的學生。不僅反共意志堅強，尤且事實昭彰（新疆反共游擊計劃落在他的

外 中 手裏)。中共大軍一到新疆，他就成爲第一號國特與戰犯；也就是第一個被追捕的人。你何必把他留在身邊，自找麻煩呢？我爲了向彭德懷與王震有所交代。正下令全省軍警，予以通緝。請你即時迫他，速離新疆爲宜。」

陶峙岳視我眼中釘

陶峙岳是甫行降共的新疆軍頭，共軍要入新疆，自應先跟他取連絡，才敢採取行動。於今他說中共大軍，要由河西入新當有可能。不過話再說回，陶峙岳經驗老道，陰險深沉，令人莫測。既能將駐新的軍師長以及中統軍統兩局的大員們都能玩得團團轉。對我再玩一次騙人把戲，當有可能。他深知我是誓死反共不低頭的全省警政主管，對他處心積慮，要「依俄降共」的主張，大加反對，不予苟同。已成爲他的肉中刺，不拔不快。而驅除我的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假借中共軍入新的大帽子，才能將我嚇走。因此當堯專員唯唯否否，應付完陶峙岳，放下耳機，就以懷疑的口吻就向我發問的說：

「陶峙岳剛才所言共軍今晚要抵星星峽，明晚要到哈密，究竟是真情？還是假話？」

我就根據我的想法，即時回稱：

「一半可能真，一半可能假？請專員先求證一下，我們再商對策！」

「怎樣個求證法呢？」

「上月廿六日省主席鮑爾漢，曾經向專員說過，俄魯史達林只准中共派三千政治人員入新，作象徵性的接收，却不准中共一兵一卒進入新疆

的事嗎？現在您老就據此爲由，打個長途電話，去向鮑爾漢質問一下，不就可知嗎？」

「對！」堯老說完「對」後，就那拿起案頭的電話機，請電話局即時掛上通省城的長途電話，時過兩分鐘就與鮑爾漢接上話。劈頭就說：

「主席老哥，你爲何要說假話，來騙小弟呢？」

「我說過什麼話，會騙過你老哥呢？」

「你上月廿六日，你會向我親口言及，史達林不准中共軍一兵一卒進入新疆。現在言猶在耳，我已聽到中共大軍，明天就要開到哈密的消息。這究竟是老兄有心騙我呢？還是史達林說話不算話呢？」

「老哥原來談的這回事，提到此事，既不是小弟說了謊；也不能怪史達林元帥言而無信，只能怪哈密國軍譁變使然。因哈密譁變起了頭，引起全疆國軍的譁變。史達林元帥爲了早日救平亂

事，才改變了主意，不僅讓中共軍入新；爲了爭取時效，還要調俄國五十架巨型運輸機，派到蘭州，去趕運中共大軍入新，以便早日平亂。」

鮑爾漢還想說幾句拉攏的話，想安撫堯樂博士在哈密，不要輕舉妄動。但堯樂博士求證明確後，就不願再跟他多話。即時放下話機，轉頭向我說：「中共軍入新，已成定案，明日抵哈密，也是事實。那我們如何應變呢？」

「您老是土生土長新疆維族領袖，尤且還是民選專員，哈密還是中共軍入新第一站。他們尚需借重您老的力量，來維持地方治安。因此在短期三月內，共軍還不會打您老的壞主意。您老在三月內，就可把游擊總部組成。在有了保障生命力量後，就可擺脫共軍的控制，採取自由行動了！然而此時此地，我却無容身之地，不能再爲專員幫忙了，只有早日遠離新疆之一途了！」

(未完待續)

郵政「存款匯票(入戶信匯)」省時·省事·安全·請多利用!

*「存款匯票」係將匯款直接匯存受款人在郵局開立的存簿儲金帳戶，既安全可靠，又更迅速簡便。

*匯款時請在匯票請購單受款人姓名地址欄寫明，存入某某郵局第 號某某某存簿儲金帳戶，並填寫一張受款人儲金帳戶之存款單。匯款郵局當日就會將匯票直接寄給兌款郵局，存入受款人的儲金帳戶內計息，免去你自己寄匯票的麻煩。另填一張「存款匯票匯款通知單」交匯款郵局寄給受款人。

*受款人既不必簽收掛號信，也不必趕着去郵局領取匯款，等要用錢的時候，隨時都可以去提款並補登儲金簿。

*受款人再也不必擔心掛號信或匯票失落被人冒領了。

*受款人如果還沒有郵政存簿儲金帳戶，請即向附近郵局開立。手續簡便，新臺幣拾元以上便可開戶，但不要忘记攜帶身分證和印鑑用的印章。然後把立帳郵局名稱、帳號和戶名告訴匯款人。